

山西票口

研究

三晋文化研究丛书

李永福著

一部记录由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的商业史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山西票号研究

李永福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怀科

封面设计：山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西票号研究 / 李永福著. -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7. 6

(三晋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80193-589-2

I. 山... II. 李... III. 票号 - 经济史 - 山西省
IV. F8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1929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 100027 电话: 64153909

网址: www.chgslcbs.cn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4.5 49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93-589-2 / F·237

总定价: 66.00 元

目 录

MULU

导 言 / 001

一、问题的提出 / 001

1. 山西票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001
2. 山西票号具有重要的借鉴功用 / 003
3. 有待开拓和发展的学术领域 / 005

二、目前学术研究状况 / 005

1. 新中国成立前的山西票号研究 / 005
2. 新中国成立后的山西票号研究 / 006

三、研究目标与内容 / 008

1. 山西票号研究的主要目标 / 008
2. 山西票号研究的主要内容 / 010

四、研究方法的运用及存在的不足 / 012

1. 研究方法的运用 / 012
2. 存在的不足 / 012

第一章 晋商与山西票号的兴起 / 014

一、明清两代山西多富商 / 014

二、山西票号创办的客观条件 / 022

1. 清代商品经济概略 / 022

2. 金融业嬗递 /	027
3. 民信局的运输功能 /	036
三、晋商创办票号的主观努力 /	040
1. 商风压倒文风的人文环境 /	040
2. 商驾驭商机能力面面观 /	044
3. 从兼营汇兑到专营汇兑——山西票号的出现 /	055
第二章 山西票号概述 /	065
一、初始阶段的示范效应 /	065
二、汇兑京协饷后的大扩展 /	072
三、汇兑外债赔款后的“回光返照” /	085
四、惨然退出历史舞台 /	097
第三章 票号业务结构与资本属性 /	108
一、票号业务结构 /	108
1. 1823—1861 年票号业务结构 /	108
2. 1862—1893 年票号业务结构 /	110
3. 1894—1911 年票号业务结构 /	119
4. 1912—1940 年票号业务结构 /	127
二、票号资本属性 /	136
1. 《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的启示 /	137
2. 高利贷资本说 /	143
3. 近代借贷资本说 /	153
4. 兼容说 /	156
第四章 山西票号与南帮票号 /	162
一、南帮票号 /	163
二、两帮票号经营策略的差异 /	165
三、两帮票号有所区别的结局 /	183
第五章 山西票号经营之道 /	195
一、山西票号的生存空间 /	195

二、山西票号运作中的制度因素 /	203
1. 顶身股理念的细化 /	203
2. 严格的管理制度 /	214
第六章 山西票号衰亡诸原因 /	237
一、政治、军事冲击对山西票号的影响 /	237
1. 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的区别 /	238
2. 屡次遭受损失程度不一 /	250
二、制度因素对山西票号的制约 /	259
三、无谓消费削弱了票号资本家的实力 /	273
1. 社会消费 /	274
2. 家庭及个人消费 /	277
第七章 余论 /	286
一、立业之本——从“纷繁”中捕捉商机的能力 /	286
二、管理之基——从“人治”到“规治”的转向 /	288
三、经营之魂——崇尚信誉与广泛交流 /	291
参考文献及书目举要 /	295
后记 /	303



导 言

山西票号是晚清民间自发创办的旧式金融机构，滥觞于道光二十三年（1823年）左右，兴盛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延至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条件嬗变，趋于衰落，并最终于1940年退出历史舞台。在山西票号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几乎垄断了国内埠际间汇兑业务，并赢得中国金融界“执牛耳”的显赫地位。本文的主旨，意在山西票号做一全面考查，从中探讨其敢为“天下先”的主因；通过与同时代其它金融机构的对比研究，总结其顺利经营的诸多因素；梳理制约其发展乃至生存的一系列“瓶颈”，以期对现代中国金融改革有所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之所以选择山西票号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1. 山西票号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山西票号是一客观历史存在，其成败兴衰，必然会对当时社会产生诸多影响。史料方面，时人的记述及后人的追忆为其一；各地方志及西方诸国的领事报告和海关报告为其二，这些泛泛而谈的史料虽显散乱，但为我们解读山西票号做好了铺垫。若从学理分析，山西票号的研究价值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史上的研究价值。山西票商是晋商的延续，晋商肇启于明朝初年的开中制，到清朝中期又经营旅蒙贸易，经由山西票号把其推到极致。晋商衍变史是中国区域经济史的亮点，它与南方的徽商共同激活了中国封建经济。表面上看，山西票号仅为一区域性的民间私营金融机构，实质上，随着时间推移，与其交往客户的层面有逐渐扩大之势。先是全国各地的工商铺户，再次到官府，最后竟与

外国驻华银行也扯上了关系。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关系,山西票号与官府的关系,山西票号与中国近代银行及外国驻华银行的关系逐一引起经济史学者的关注。

金融学上的研究价值。日本学者称谓山西票号为中国的“国家银行”,而各地钱庄则为“地方银行”。日本学者之所以有此评价,缘于山西票号的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几乎承担了清政府所有京协饷的汇兑业务。该立论虽失之偏颇,但也道明山西票号的基本功用。山西票号的主营业务为汇兑,受此冲击的,首先为镖局解现市场。许多学者选择了汇兑汇费与镖局解现花费的对比研究为突破口。清政府京协饷拨解向有定制,由专委的官员装鞘解现。受太平天国战事冲击及山西票号汇兑便利的影响,以往旧制略有变更,由此山西票号承担了部分京协饷的汇兑。汇兑汇费与京协饷解现支出的对比研究亦勾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山西票号与中国近代银行及外国驻华银行在存放款利率及汇率上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山西票号的“无限责任”性质与近代银行的“有限责任”性质的优劣评判,学者多有涉猎。“合伙制”是山西票号的一般组织形态,几乎各家山西票号都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调动员工从业积极性,山西票号普遍实行“顶身股”制,票号资本家通过让渡部分利益,甚至一大半利益,增强了山西票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上观点能够明确,得益于各票号号规、合约、账簿的不断被发现,尤其归功于勤学不辍的研究者。随着该类史料的不断充实,量化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它亦是以后的研究趋向。

社会学上的研究价值。由于山西票号各地分号多加入当地的晋商会馆或山陕会馆,票商的生活习俗及文化理念亦影响到与之交往的商民,最直观的体现为带有山西地方特色的戏曲及饮食,社会史学者于此关注颇多。重农抑商是封建社会的特有惯性,虽则如此,在山西腹地,商民已悄然将其倒置,最明显的例子为:在山西票号诞生地——平遥,流传着这样的民谚:“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翔,三子无出息,也是程清泮。”雷、毛、程三人都担任过山西票号的总掌柜,他们生活的年代为清朝末年,在“儒学一尊”时代,位居四民之末的资本商人能获得如此殊荣,反映了山西人的价值观已发生转化,山西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观

念新陈代谢最为活跃的地区。此方面的史料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

总括以上各点,不难看出,山西票号研究的空间极其广阔,其学术价值趋向亦是多维的。不惟如此,在提高民族自信心方面,山西票号也有贡献,诚如梁启超的评价:“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以有历史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票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①梁的上述发言,背景年代为1912年。就当时而言,晋商中唱主角的应该是山西票商,况且款待梁的正是在京的22家山西票号。梁的即席演讲并非溢美之词,他在日本流亡时一定听说过中国的合盛元银行,甚或经由该行向国内汇过钱款。而合盛元银行正是山西票号合盛元在日本开设的分支机构,《大公报》的记载可资为证:“启者,近来环球大通,商务争盛,而国家特设专部鼓励讲求,惟我商人亦须及时起发,以图扩充。乃观各国银行来吾帮开设者甚多,其晋之汇业一途亦与银行所司无异,然独不能出洋半步,良可概也。(本号)有鉴于此,特选派妥人,提出重款,先至东洋各处创设支庄。”^②合盛元神户支行开办于1907年4月30日,半年之后,该票号又在日本的东京、横滨、大阪及韩国的仁川开设分庄,合盛元票号实开创中国人在海外开办银行的先河。

2. 山西票号具有重要的借鉴功用

“学以致用”是学术立身的主要功用,山西票号研究亦循此规。山西票号承载了晋商深厚的经营文化底蕴,它的一些经营理念及运行模式对现代社会经济具有明显的借鉴功用。

“以信为本”是山西票号的经营特色。山西票号放款业务向来看重商家信誉,一般不做抵押贷款,这在现代社会简直匪夷所思,但山西票号乐此不疲,并依此经营特色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以上经营理念要求与之配套的大环境。首先是政局稳定,该因素亦是一切经济组织正常运行的必备条件。山西票号中前期的顺利经营与较少的政治、军事冲击关系甚大。其次是正常的商业习惯及商业心

^① 《梁任公莅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词》,《大公报》1912年11月6日。

^② 《大公报》1907年3月22日。

理。晋商“以信为本”的商业习惯由来已久，闻名塞外的复盛公商号就是靠与之交往商号的信誉支持才勉强站稳脚跟，并最终成就为著名的大商号，山西票号承继了晋商的优良传统。正常的商业心理至关重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的钱一定要赚，但不应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欺骗心理，坑害商家。山西票号的主营业务为汇兑，存放款业务亦是为方便商家调拨各地款项而设立（由顺汇及逆汇衍变而来存放款业务）。^①山西票号总分号极为注重自身信誉，很少有拖欠客户存款事例的发生。敏锐的观察力是落实“以信为本”的主要手段，它也是该经营理念的核心要求。考查市场、调研客户的职责一般由各票号的跑街来承担。各票号号规也有严格规定，在开拓新市场时，先做汇兑业务，待市面熟悉、各商号内情了解之后，再做存放款业务。由此而知，山西票号对商号“信誉”的考评及论证是极为重视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的空间愈来愈大，尤其是入世后的契机更为商家提供了便利。但不正常的商业心理及难以启齿的商业习惯屡屡使我们的形象受损，贻误了许多发展良机。这些由少数商家所造成的危害已引起经济界人士的广泛关注，“重塑形象，以信为本”再次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比照于山西票号的经营特点，其中的启示一定不少。

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是中国现代企业改制的主要目标。考之于晋商，它早已初现端倪。晋商商号的组织形态一般为“合伙制”，也称“东掌分离制”。所谓的“东”，即各商号资本家，而“掌”则为“掌柜”，相当于现在的总经理。各商号股东负责出股银，而经营权乃至人事权完全由总掌柜定夺。此方面记载，由于史料散逸，难以概括总结，但在山西票号的合约中却频频出现。作为晋商的承继者，这一点不足为奇。山西票号为调动从业人员的积极性，还广泛设立“顶身股”制度，顶身股的号友可参与票号的账期分红。在山西票号的中后期，人力股数居然超过了银股数。山西票号的一些分红账中，还记载有“故身股”制度，意即票号号友去世后，家人还可根据其于号内所顶的身股数，在一定年限内领取故身股银。山西票号以上制度及规定，对现代企业启示颇大，尤其对有可能滑向“家族式”

^① 参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6 页。

管理的民营企业无疑为一贴清醒剂。

3. 有待开拓和发展的学术领域

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是山西票号创办的前提条件,学人对此已达成共识。但具体到各商业网点的商品种类及其流向的梳理,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山西票号汇率,散见于总分号间往来信稿中,它亦是山西票号取代镖局运现以及京协饷解现的内在因素,但学人对后者的量化研究略显不足,两者间的对比研究更为缺乏。有关山西票号资本属性的争论由来已久,相对应的观点为高利贷资本和近代借贷资本,两种观点所依据的评判标准皆为《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的启示,重新加以界定以形成共识很有必要。山西票号衰败原因,各种版本的山西票号史中多有论述,但总括性的逐条缕析相对较少,该方面研究也是笔者尝试的主要目标。

二、目前学术研究状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山西票号研究是在借鉴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旨在对山西票号做更深入、更具体的探讨。已有的学术成果,不仅能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同时又具有思想启迪意义。

1. 新中国成立前的山西票号研究

由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其中的“农商类”记载了山西票号的一些相关资料。西方人的研究始于外国传教士,英籍传教士艾约瑟于1905年出版了《中国银行与物价》一书,西方人经由该书开始了解山西票号。英国学者瓦格尔在《中国金融与银行》一书中,对山西票号赞誉有加,甚至断言世界上近代汇票和贴现办法,也都是“山西票庄首先倡用的”。日本学者编辑的《支那经济全书》成书于1907年,该书称山西票号为中国的国家银行,而各地钱庄则为地方银行。以上四书,限于史料,结论难免武断,但仍不失为重要的参考书目。

山西票号“起源说”是本时段山西票号研究的热门话题。以上四书,有持“隋唐说”(英国学者的观点),有持“明末清初说”(徐珂及日本学者的观点)。“康熙乾隆说”是山西票号故旧的观点,该立论依据可参考曾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分号经理的李宏龄于1917年编

辑出版的《同舟忠告》及《山西票商成败记》两书。由山西商业专门学校编著的《晋商盛衰记》，把山西票号鼻祖日升昌的创办者雷履泰定位为乾隆嘉庆年间人氏，赞同该观点的还有陆国香和范椿年。侯兆麟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一文中更提出了“鸦片输入因素说”。陈其田于1937年出版了《山西票庄考略》，在批驳以上各种观点之后，他把山西票号的起始年代笼统界定为“清朝中期”。卫聚贤祖籍山西，曾在孔祥熙主持的中央银行经济调查处兼职。1936年，奉孔氏之命，他特地返回故里，在平遥、祁县、太谷等县做详细的实地调查。在调查中，他一方面搜集到票号的许多合约、号规、红账、信稿及账册等文物资料，另一方面又组织票号遗老撰写回忆记述性文稿，同时还抄录了一些相关人士的墓志铭等资料。以上资料，大部分用于1944年编著出版的《山西票号史》，少部分刊发在《中央银行月报》上。卫聚贤对山西票号“起源说”的认同为：首家票号日升昌创办于道光四年（1824年）。

山西票号的总数及各地分号的详细数据，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有明显的错误，原因在于把许多钱庄及南帮票号划归山西票号名下。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陈其田的观点仅为泛泛而谈，缺乏层次感。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史料翔实，但少有理性分析，尤其倾注了人文情怀。有关山西票号的操作系统，卫聚贤的叙述比较可靠。受时代限制，以上两书都未对山西票号的性质做深入探讨，尽管如此，两书的架构仍具有里程碑意义。

2. 新中国成立后的山西票号研究

1982年6月，在山西太原举行了建国以来首次山西票号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共递交论文14篇，并于会后整理刊行，书名为《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一辑。本次会议主要讨论山西票号资本属性，学者观点系分两派，以孔祥毅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称山西票号资本为高利贷资本，而以黄鉴晖为代表的少数派却坚持其为近代借贷资本。

山西财经大学（前身为山西财经学院）是建国以来研究山西票号的主力军，借着地域的便利，以及集团化研究的优势，使得该校成果斐然。孔祥毅与黄鉴晖皆执教于该校，孔祥毅关注于山西票号与官场的联系，其代表作为《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而黄鉴晖

选择了大势上把握，其最大的成就为积几十年研究心血于1992年出版了《山西票号史》。黄鉴晖把山西票号的起始年代确定为道光三年（1823年）前后；山西票号的资本属性则为近代借贷资本；对山西票号的具体运作阐述得更为详细。

张正明供职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晋商是其主攻方向。在《晋商兴衰史》一书中，他以历史眼光考查了山西票号在晋商衍变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分析了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张正明对晋商经营理念也有深入研究，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刊行的《晋商与经营文化》一书是他的又一代表作，其中有关票商的经营策略占了很大篇幅。

山西师范大学的山西票号研究工作由史若民牵头，已经刊行了多套资料集，并出版了《山西票号史》等专著，该学术团队与山西财经大学形成了南北呼应的研究态势。

《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国辉的大作。该书的视角为中国钱庄与山西票号的对比研究，尤其以两者在上海的相互交融、互相竞争为考查重点。略显遗憾的是，因山西票号在该书中仅处于从属地位，难免有挂一漏万的瑕疵。

一般性论述，则有刘建生、刘鹏生编著的《山西近代经济史》，张海鹏、张海瀛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范勇编著的《中国商脉》等等。论文方面，不胜枚举，比较有影响的为李龙潜的《山西票号性质及其作用》，秦佩珩的《清代晋商的发展、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李瑚的《清代的票号、钱庄与银行》等等。

资料方面，首推姚贤镐主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该书刊行于1962年。在书中，收录了西方各国驻华领事及海关监督所做的领事报告和海关报告，有部分史料就是以山西票号为评述对象。最有份量的史料汇编，当属由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与山西财经学院联合编写的《山西票号史》。该书初版于1990年，再版于2002年。再版内容几乎收录了与山西票号相关的现有史料。该书编辑由黄鉴晖领衔，可见山西财经学院在山西票号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总体而言，山西票号研究领域虽有以上丰硕成果，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有明显不足。例如，要评判山西票号的资本属性，必须

进行量化分析,以前的研究成果,或泛泛而谈,或浅尝辄止,没有触及问题实质。山西票号的运作细则及经营网络,各种版本的《山西票号史》都有介绍,受史料或选题方向限制,各位学者仅就事论事,很少提升到制度层面。山西票号衰败原因,多集中在票号业的“无限责任”性质及“信用放款”制度,缺乏以理性眼光比对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山西票号与南帮票号的对比研究,平铺直叙的文章比较多,深层次探究的反而少,很难解读两帮票号不同的命运结局,是故笔者也把该课题选为研究的突破口。

三、研究目标与内容

1. 山西票号研究的主要目标

山西票号虽为一金融机构,但与其相关的研究往往涉及到政治史、经济史、金融学、社会学诸学科知识。概而言之,山西票号是一边缘学科。本文拟以经济史为主线,融合政治史、金融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对山西票号有待商榷的课题逐一展开研究,笔者所确立的主要研究目标为:

其一,梳理晋商的发展脉络,概括总结成就晋商的主客观条件,以强调晋商在从兼营汇兑到专营汇兑艰难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晋商称雄商界五六百年,先是得益于明朝初年的“开中制”;明朝中期的“开中折色”,使得部分晋商由“边商”转变为“内商”,加强了与产盐区商民的交流;清朝初期,8家晋商承担了“皇商”角色;清朝中叶,国家统一,天下太平,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更为地狭人稠的山西提供了发展契机,旅蒙商成为晋商的主角。另一方面,随着商业资本的步步集中,为之提供资金服务的金融业已呈现出不合时宜的窘像。乾嘉之际,中国部分地区爆发了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商人旧有的起镖运现做法受到极大冲击,而兼营汇兑又缓不济事,善于把握商机的晋商再次从中受益。客观因素与主观努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若缺失主观努力,晋商也不会有以上成就。对转型中的晋商而言,沿袭已久的运货孔道受到战争的影响,历史上唐宋两代的汇兑经验可资借鉴,散居各地的晋商为专营汇兑业务提供了最稳定的客户源。山西的风土人情维系着重商理念的养成,晋商的锐意进取精神正是根基于山西雄厚的商业

文化底蕴。客观与主观的结合,催生专营汇兑的票号业,首家票号日升昌之所以能够创办,就是因为具备了以上主客观条件。

其二,以旧有的运解现制度,以及同时代的诸金融机构为参照系,比对山西票号的同向经营,分析其在经营上的得与失。运解现制度包含官方及民间两个层面,官方情形,意指京协饷装鞘解现制度;民间情形,大批量的长途贩运贸易多以起镖运现完结。比较于票号的汇兑方法,它们的落后性是显而易见的。以量化的史实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无疑更具有说服力,它亦是山西票号汇兑业务能够得到商民惠顾及官府默认的最主要原因。与山西票号同时代的金融机构,前期有典当行、钱庄、账局,后期又增加了外国驻华银行及中国自己创办的近代银行。部分金融机构先后介入汇兑业务,不可避免地分取了山西票号固有的业务份额。存放款利率,山西票号历来不高,以上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国近代银行及外国驻华银行的强有力竞争,使得山西票号不得不略作调整,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山西票号“与时俱进”的应变能力。山西票号的“无限责任”组织形态,在世风日衰的冲击下,落后性逐渐显现,制度上的不合时宜,最终导致它的衰败。人们在反思的同时,不难发现,正是这些衰败之因促使其起初的兴盛,“相悖论”的二难处境困惑了山西票号研究。以上困惑要求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要以历史大视角解读不同时期的商业习惯及商业心理,它也是社会学功用在山西票号衍变中的重要体现。

其三,探寻山西票号衰败主因,渐次剖析各原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期对现代社会有所裨益。界定山西票号衰败的主因,须以全局观加以把握。军事冲击的后果,一为政局动荡,二为商业衰退,两者共同导致了山西票号的衰败。主因中亦有侧重,商业衰退只不过是军事冲击及政局动荡的表象而已,并且有愈来愈严重之势,即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步步加深,中国经济每况愈下。以之为服务对象的山西票号业,其衰败的命运也就不言而喻了,以上结论是在考察山西票号各个阶段具体业绩之后得出的。山西票号衰败的次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制度“瓶颈”,主要表现为组织形态的“无限责任”制及具体业务的“以信为本”理念。笔者把它们归结为东西方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即西方人经商以“防人”为

主,所以就有“有限责任”制及“抵押贷款”,以规避有可能的风险。而东方人以“诚信”为本,凡认可的往来客户,几乎毫不设防。山西票号无奈地充当了时代的牺牲品。其次,山西票号各掌柜对该业的衰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承担主要责任似乎不太公允,即如按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的倡议筹组山西汇业银行,也难以想象它能竞争过有特权作保护的外国在华银行及有政权作后盾的中国近代官办银行。再者,大多数票号资本家的奢靡生活削弱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总而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统一的货币体系及平等的国民待遇。以上观点的剖析,对现代社会“诚信”理念的养成有诸多借鉴意义。

2. 山西票号研究的主要内容

山西票号内容庞杂,头绪繁多,远非本文所能尽述。为避免重复研究和泛泛而谈的高论,本文选择了七个有典型意义的课题逐一探讨,以期达到以管窥豹的效果。当然,这七个课题,层次不同,有些是必须的铺垫工作,有些则延伸到山西票号对现代社会的启示,现分述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探讨晋商的发展脉络,以及与山西票号的关系。众所周知,票商是晋商的余脉,欲了解山西票号,首先要分析晋商兴起的主客观条件。与临近的河北及陕西两省相比,晋商的成就有目共睹,除却天时与地利的共性外,“人事因素”被提上议事日程。笔者正是从该方面入手,重点解读山西重商文化的养成。山西票号又是借者与贷者的桥梁,信誉的内在要求,庞大的晋商群体,以及自身利益直接受到连绵不断战争的冲击,另外还有前此兼营汇兑的经历,都为晋商抢占金融业转型的先机增添了说服力。

第二章,以量化史料为基础,概述山西票号衍变史。山西票号存在的一百多年间,经历了四个时段:其一为初始阶段的示范效应;其二为汇兑京协饷后的大扩展;其三为汇兑外债赔款后的“回光返照”;其四为惨然退出历史舞台。与前人及时人的研究手法不同,笔者着力在量化上下功夫,主要依据山西票号总分号变化趋势,存放汇业务的此消彼长,以及表面繁荣下所隐藏的深层次危机等具体变量。

第三章,尽可能统计出票号经营官款业务的比例,为重新评价

其资本属性作好铺垫。表面上看,票号确实承汇了大笔官款,这也是最容易引起误会的话题,问题的关键是经营官款业务在票号总业务中所占的比例。本章第一节重点统计票号业不同时段汇兑官款的比例,该项业务低于20%的统计数据,为第二节的重新评价打下了坚实基础。转型期的票号业,资本属性相对复杂,由此笔者提出了“兼容说”,意即票号资本既有近代借贷资本属性,同时也不能排除高利贷资本属性。

第四章,比对山西票号与南帮票号的异同,从而揭示导致两帮票号迥异命运的内外因素。南帮票号晚于山西票号,其资本家多与官场有密切联系,有些甚至是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主要依靠官款及热衷于投机生意是其过早衰败的最主要原因。反观山西票商,始终以民营业主身份稳步经营,很少有投机生意的冒险举动。即便经营官款,由于在总业务中所占份额有限,不足以影响其正常经营。基于此,才出现有影响力的南帮票号纷纷倒闭,而有实力的山西票号却能巍然屹立商界几十年乃至一个多世纪。

第五章,解读山西票号经营理念,探究其成功之道是本章的主旨。山西票号的操作系统,前人及时人多有论述,笔者主要集中于制度层面考虑,其一为顶身股理念的细化;其二为严格的管理制度。两者并行共用,既调动了票号员工的积极性,同时也规避了潜在的风险,山西票号的顺利经营与此有着直接关联。

第六章,以“清亡,票号亦亡”的观点为引子,重点考查山西票号衰败的主要原因。山西票号普遍衰败于辛亥革命和“壬子之乱”(指1912年在北京、天津等地发生的军人哗变事件)之后,缘此票号界有“清亡,票号亦亡”的观点。笔者列举了三条理由予以反驳,其一为政治、军事冲击对山西票号的影响;其二为制度因素对山西票号的制约;其三为无谓消费削弱了票号资本家的实力。以上三条中,政治、军事冲击无疑是山西票号纷纷倒闭的罪魁祸首,即使清廷能够苟延残喘,依大多数票号的账面实情,除非有大笔资本金补进,它们才有可能坚持下来。总而言之,是诸因素的合力才导致山西票号的衰败。另,本章中引用的一些资料,原著者有其历史局限,请读者注意斟酌。

第七章,山西票号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对现代中国民营企业